

主 编：杨建文
副主编：朱伟明

新论 三国演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三国演义》论坛一瞥（代前言）

· 杨建文

奉献在诸位方家面前的，是中国“全国第十次暨湖北省第五次《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会议在湖北宜昌、当阳召开。宜昌，古名夷陵，或彝陵，东汉末属荆州南郡，是《三国演义》所描写的“彝陵之战”的主战场。当阳，更是留下了三国时代群雄征战足迹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虽经“几度夕阳红”，却是“青山依旧在”。猇亭古栈道，仍壁立江岸，目送着滚滚长江东逝。关公显圣处，犹座落山巅，俯视着巍巍群峰西来。擂鼓台上的风云，长阪坡前的尘土，似犹舒卷飞扬着当年的刀光剑影、战马嘶鸣。玉泉禅寺的晨钟暮鼓，关陵享殿的古柏苍松，至今仍默默诉说着关公的凛然大义、耿耿忠怀。足可见《三国演义》与宜昌、当阳关系的密切。群贤相聚彝陵，纵意畅论《三国》，虽不在发思古之幽情，却大有助于探《演义》之精微，真可说是得历史与地理之独厚了。

与会的近百名专家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达 70 余篇。会议本着我们一贯倡导的“本体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精神，就《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文本整体思想艺术价值、主要人物形象、深厚文化蕴涵，以及《三国演义》与企业竞争、现代商战、政治军事谋略、人才政策、三国人文景观的开发、同名电视剧的二度创作等研究课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学术讨论，既深化了《三国演义》的本体研究，又加强了《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在诸多方面有了新的视角、新的观念和新的深度，标志着《三国演义》研究正迈开大步，走上当代文化

建设的新轨道，并朝跨世纪的方向突进。收录在这部论文集里的近40篇论文，正体现着当年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

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至今仍无定论。当今学术界主要有四说：“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成书于元代中期”说；“成书于明初”说；“成书于明中叶”说，而较通行的观点是成书于元末明初。与此相关的罗贯中的籍贯、生活时代问题，历来也有“太原”说、“东原”说、“杭人”说、“庐陵”说种种，同样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次学术会议上，提交这方面论文或在会上作了这方面发言的与会者，既对旧有文献作出了新解读，又提供了一些新资料。有的论者再次对传统的“元末明初”说进行驳议，明确提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的观点，并且认为“罗本贯中是成化弘治正德年间人”，“他与元明之际的戏曲作家罗贯中其实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人”；至于罗本贯中的籍贯，“蒋氏的东原说与郎氏的杭人说有所不同”，“这是文人行止不定，或祖居客居两地造成的”。当然，也有的论者对此提出质疑：《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否一定就是最接近罗贯中原本的文本？因此，《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目前尚不宜匆忙作结论。又更有一些与会者认为：《三国演义》成书年代、作者籍贯的研究固然十分重要而必不可少，也非常需要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就文学研究的全方位工程而言，我们的审视眼光，似乎还是应该主要投向业已提供在人们面前的多种版本之文本本身的研究，不宜像曾一度以局部的“曹学”几近压倒整体的“红学”那样，形成太多的人涌向考索之路的趋势，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本本身研究的深入。

《三国演义》是一部民族文化包容量极大的历史演义小说，其文化蕴涵十分丰富，又相当复杂。笔者曾经提出过：《三国演义》本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博大载体。这是学术界已有人开始研究的“《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题的基本依据。但问题远非如此狭小单一。三国历史故事的产生、品评、迁流、旁收、演进、汇总成书，以及此后历代直至当今对该书的批点、评改、品论、应用、改编，

1 700多年来,不仅与时刻发展着的中华文化同步并又同构,而且业已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汉魏时代铸就的三国时代文化心态的外化,又是汉魏以后历代世人对由这种外化所构成的“三国文化”的主动接受和阐释;其包容量与涵盖面,不仅丰厚于“三国文化”的历史积淀,而且既超过了《三国演义》本体的文化蕴涵,又突破了“《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题的研究范畴,我们称它为“三国演义文化”。“三国演义文化”有它产生、形成、发展的无止境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原型三国演义文化阶段(三国时期);前导三国演义文化阶段(两晋至宋元时期);本体三国演义文化阶段(元末至明中叶);后续三国演义文化阶段(明中叶至今及未来)。这四个阶段反映了“三国演义文化”由积淀与生成,经丰富与发展,至结晶与升华,到流变与拓新的历史过程、文化内涵和迁流走向,及其在中华文化母体内形成的原因。此次会议因为在湖北当阳召开,这里有关陵和玉泉寺,所以得天独厚地讨论了“关羽文化现象”问题。不少论者从由历史上的关羽到小说中的关羽,由人的关羽到神的关羽,形成“关公崇拜”这一关羽文化现象的历史过程、主要原因及其文化蕴涵等不同角度展开分析。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关羽从一个历史人物演化为传奇式英雄,再演化为神,贯串在其中的,就是“义”和“勇”两种精神;社会呼唤义勇,“义勇之神”于是产生。因此,忠义和勇武构成了关羽文化的基本内容。而忠义和勇武,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我们民族存在,这种文化就存在。纵观关羽由人到神的演变,其中既有封建帝王为维护其统治而推崇关公的历史原因,也有民众对神灵的虔诚的信仰因素,但崇拜关公,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关公人格精神的敬仰。所以,关公崇拜,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现象,是人们对真、善、美的人性和崇高的人格向往与追求的一种人文心态的反映。至于诸葛亮崇拜,桃园结义崇拜,虽然这次会议没有重点论及,尽管别具意蕴而较为复杂,但置于“三国演义文化”的整体框架和流变过程中详加考察,仍可探究出其有益于世道的人文精神。

《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是当今《三国演义》论坛的又一热门话题。这固然是由于《三国演义》本身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谋略,更因为现代生活有这方面的需求。但我们历来主张,对于《三国演义》,应该是以本体研究为主,而兼及应用研究,并注重本体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所以,我们认为,《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要遵循三大原则:既要古为今用,更应古为今鉴;务必克服小农意识,强化现代观念;应由“比附”研究上升为“规律”研究。据此,在这次《三国演义》论坛上,就《三国演义》与企业竞争、现代商战、人才政策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有的论者认为:《三国演义》尽管“为企业管理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方法,如用人艺术、决策管理等等,但同时也留给后世深刻的历史教训,如德性文化对智性文化的钳制与压抑,就体现了传统道德判断的深层缺陷。前者可引以为用,后者则应引以为鉴。”有的论者指出:中国古代重人治轻法治,“没有控制历史正常运行的机制”;在人才问题上,崇尚“伯乐识才”而忽视人才资源的“政策开发”,前者属小农意识,后者才是现代观念。这方面,曹操发布用人唯才的求贤令,刘备用人过程中的“感情投资”,倒是带有一点现代的色彩。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别开生面的。这种审视,都渐脱“比附研究”的陈规,而开始走向“规律研究”的新途。因此,我们深感现代商战与企业竞争,既为拓宽《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提供了契机,同时也向《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提出了挑战;我们当今的应用研究,应该是“现代的”、“规律性的”应用研究,要强化应用研究中的当代意识与规律意识。

至于三国人文景观的开发和《三国演义》的二度创作(如《三国演义》电视剧的编导制作),从旅游资源开发和当代文艺建设方面看,除了经济效益之外,应该主要是“三国演义文化”,特别是其流变过程中的“原型三国演义文化”与“本体三国演义文化”的复原和再现;《三国演义》的二度创作,本身又是“三国演义文化”的延伸,而构成当代意识观照下的一种新型的“后续三国演义文化”。因此,三国人文景观的开发,要特别注重和大力加强文化开发,做到不单

是景观的复原,更是人文精神的弘扬,人文氛围的营造。《三国演义》电视剧的二度创作,作为用新的传媒对原著进行解读,至关重要的是要注意处理好再现本体和重构本体的关系。这次会议,大家比较一致地肯定了《三国演义》电视剧二度创作的基本成功和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加速同世界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的功不可没的贡献。但却正是在再现本体与重构本体关系处理的得当与否上产生了一些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三国演义》电视剧突出的艺术成就,“是以视觉形象准确地把握和再现了原著的审美时空建构和历史风貌”,同时又“蕴含了编导的二度创造和新的追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电视剧“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原著的‘尊刘贬曹’精神”,美化了曹操这个“乱世奸雄”,“在社会行为和社会道德价值取向方面引起了混乱”。然而有的论者反倒觉得“电视剧对原作一定程度的改动,顺应了时代的需求”,“拥刘反曹主题显然与今天的社会需求渐渐脱节,与时代的发展渐渐远离。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二度创作中必将对主题作出变革”。这当然涉及到许多相关的问题,如小说主题的把握、曹操的评价、二度创作中忠实于原著与当代意识的关系等问题,自应从多方面去进行研究和评析。

这次学术盛会,由于时间的有限和中心议题的框定,不少问题尚未论及。如《三国演义》的作者对三国历史、人物,对三国文化的情感体悟与把握,就引起了部分论者的关注,而未能在会上展开讨论。窃以为《三国演义》绝非图解政事之谋略教科书,实如感悟历史之怀古抒情诗。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源于其“前导三国演义文化”中的宋元说话之讲史;讲史话本一般都称为“平话”。“平话”的得名,固然如《浦江清文录·谈〈京本通俗小说〉》一文推断“是平说之意”,程毅中《宋元话本》说是“可能指平说的话本,也就是不加弹唱的讲演,与诗话、词话相对而言”,但从明清人将其写作“评话”看,似乎又还有评论、议论之意。而有评论、议论之意,加之其间也穿插了一些诗词(如《三国志平话》叙及赤壁之战即有诗曰:“赤壁

鏖兵自古雄，时人皆凭畏周公；天知鼎足三分后，尽在区区黄盖忠。”）则自必有说话人体悟历史与人物的情感在内。即就故事的叙说而言，也渗透有强烈的情感倾向。因而才会产生“闻刘玄德败，輶辇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的情感接受效应（苏轼《东坡志林》卷一）。“说三分”是这样，同属“前导三国演义文化”的宋元“三国戏”也莫不如此，而且更是以情感人。像《单刀会》、《双赴梦》尤堪称情浓意深的佳作。如《单刀会》演关羽赴会时对历史兴亡的感慨：“[胡十八]恰一国兴，早一朝灭。那里也舜五人，汉三杰？两朝阻隔六年别，不付能见也，恰又早老也！开怀的饮数杯，尽心儿笑一夜。”又凭吊赤壁之战道：“[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檣橹当时绝，鏖兵江水元由（犹）热。好交我心下情惨切！二十年流不尽英雄血！”（第四折）其间洋溢着的历史苍凉感、英雄悲壮情，撼人心魄。至若唐宋三国故事诗词，如李白的《望鹦鹉洲悲祢衡》，杜甫的《蜀相》、《八阵图》，刘禹锡的《蜀先主庙》，杜牧的《赤壁》，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无不都感人至深。

受上述“前导三国演义文化”的深刻影响，作为“本体三国演义文化”载体的《三国演义》，自必既包蕴着其前代诸多“前导三国演义文化”中对三国历史与人物体悟的情感积淀，又渗透着作者自身体悟三国历史与人物的深深感喟。且不说无论哪种版本的《三国演义》中都有那么多诗歌，用来感怀历史，赞叹人物，其强烈的情感，溢于言表，就是叙述故事，亦时有扬抑褒贬之情从字里行间流出。如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一“刘玄德斩寇立功”一则写曹操第一次出场有一段文字道：“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叹赏之情，自在言中。可是毛本《三国演义》第一回却把它删改成了如下几句冷冰冰的话：“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强化尊刘贬曹的倾向，这淡化叹赏曹操之情无疑是手法之一。至于全书末尾的那一首长

篇七言古风，更是在叙事中饱含着慨叹三国历史与人物的无限深情。它是整部小说的诗化，是整部小说情感的浓缩。古风的最末两句（也是全书的最末两句），嘉靖本为“鼎足三分已成梦，一统乾坤归晋朝”，与开首两句“高祖提剑入咸阳，炎炎红日升扶桑”前后照应，充满一种天数难逃、舆图换稿的历史梦幻感；毛本为“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更与全书开篇的首卷词中“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吟咏遥相呼应，以“空”起，以“梦”、“空”结之，倾吐的是一种较之嘉靖本更加浓重的世事如梦、成败转空的历史苍凉感。毛氏评曰：“此一篇古风将全部事迹隐括其中，而末二语以一‘梦’字一‘空’字结之，正与首卷词中之意相合。一部大书以词起以诗收，绝妙笔法。”诗词贵在抒情，“事迹”也只是“隐括”在其中，那么，全书叙述的“事迹”也就当然隐含着首尾起结的词意诗情了。这正是《三国演义》的“绝妙笔法”。著超《古今小说评林》说：“中国小说，无一书不说梦。《三国志》、《水浒》，梦在夹理，此上乘者也”，指出的也就是这一笔法的绝妙。

当然，《三国演义》体悟三国历史与人物抒写的情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认可了小说的这一特点，变政治谋略研究而为文学情感研究，自会使《三国演义》研究出现一片新天地。到那时，定非“一瞥”所能窥全，而当遍读诸方家之高论，再叙点滴心得。

内 容 提 要

本书汇集了近年来一批最新《三国演义》及“三国文化”的研究成果,其中集中对曹操形象、诸葛亮形象、关羽形象及相应产生的关羽文化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观点,对进一步普及《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巨制和弘扬三国文化,推进相关人士拓深对此领域的研究,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国演义》论坛一瞥(代前言)	杨建文(1)
《三国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	李伟实(1)
浅析“民本思想”之实质	王定瑜(10)
《三国演义》主题新论	余大平(14)
“分合说”重评	王齐洲(23)
历史意识与史传传统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历史文化心理背景	朱伟明(28)
乱世英雄的喜剧悲歌 ——《三国演义》的复杂文化蕴涵刍议	谭邦和(36)
《三国演义》与传统哲学观	王新勇(45)
《三国演义》中士与统治者的合作与矛盾	夏灵魁 刘自兵(54)
合群的悲壮 超现实主义的笔力	陈海云 孙世强 毕水海(61)
史官传统与说话传统 ——论《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品格差异的形式表现	陈文新(68)
高峰上的彩云 ——论神秘色彩在《三国演义》中的价值	刘志军(77)

《三国演义》中的泛生命意识	邸小平(84)
关羽从人到神的演化	傅隆基(92)
《三国演义》和“关公文化”	孟繁仁(110)
漫说关羽文化的魅力	胥惠民(121)
试谈关公文化的形成及其内涵	
——兼析关公文化与《三国演义》中的关公形象	
.....	董乐义(130)
彝陵之战散论	孟祥荣(142)
哀兵必胜与骄兵必败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彝陵之战”浅说	
.....	石 麟(151)
三国古战场救师口	刘明春(157)
赤壁鏖兵:从历史向文学的转化	叶松林(163)
刘备形象漫议	欧阳代发(171)
论毛宗岗对曹操形象的评改	宋克夫(182)
曹操形象的文化意蕴	雷 勇(193)
诸葛亮形象本源探	胡淑芳(204)
诸葛亮形象疵议	李晓晖(213)
全德型赵云形象的文化底蕴	单长江(224)
封建社会“寒士阶层”的完美典型的悲剧	黄崇浩(234)
浅论《三国演义》中的文士形象	楚永桥(244)
《三国演义》女性形象初探	夏志芳(251)
元杂剧艺术对《三国演义》的影响	罗斯宁(258)
《三国演义》改造《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	
.....	胡 璟(268)
容美田作《古城记》异说	吴柏森(276)
论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攻心政策	胡世厚(284)
从《三国志》中学习选择与决断	
.....	沈伯俊 译(293)

《三国演义》与企业竞争.....	李运勤(306)
湖北山川风物的三国文化内涵.....	曹祥本(316)
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	郑铁生(326)
浅议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的战争场面描写	谭良啸(334)
《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成功背后之不足	曾良(341)
后记.....	(347)

《三国志演义》成书于 明中叶弘治初年

· 李伟实

关于《三国志演义》成书年代问题，“元末明初”说在学术界仍占主导地位。几部文学史、小说史及《辞海》、《辞源》等权威工具书都是这样写的；在大、中学校的课堂上，老师们也是这样讲授的，似乎已成定论。其实，这个成说并没有可靠的证据，不过是从明后期沿袭下来的一种说法。支撑这种观点的材料有二：一是明初人编的《录鬼簿续编》上记载的戏曲作家太原罗贯中；二是万历年间个别文人的言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综合了这两方面材料，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肯定了《三国志演义》为元明间人罗贯中所作，他于1935年1月在《小说旧闻抄再版序言》中又进一步说：“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①这就是《三国志演义》被认定为元末明初作品的来历。特别是经鲁迅倡导，建国后学术界几乎众口一词，毫无异议。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元末明初”说提出了挑战，并列举了一些材料论证《三国志演义》产生于明中叶^②。由于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上留下与此问题有关的可靠资料很少，因此“明中叶”说还没有得到学术界多

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4

② 参见：张国光：《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与王利器、周村、章培恒等同志商榷，《社会科学研究》，1983，4；张志合：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河南大学学报》，1990，5；张志合：再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时间，《许昌师专学报》，1991，2

数人的认同,目前还未能改变“元末明初”说的主导地位。然而,据已经掌握的可靠资料,我认为“元末明初”说是不能成立的,历史必将证明《三国志演义》这部标志着我国长篇通俗小说已进入成熟时期的名著产生于明中叶。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元末明初”说所赖以支撑的两根支柱。

首先,《录鬼簿续编》上记载元朝末年确有一个戏曲作家罗贯中,书中写道:“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其作品有“《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从这段记载看,《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永乐末年尚健在,已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他与戏曲作家罗贯中为忘年交(自然是罗年长),如果他与罗贯中至正甲辰(1364年)复会时是20岁,那么罗贯中当时的年龄至少已接近40。在此之前,罗除了创作戏曲之外,还有乐府和隐语,也是颇可称道的。但罗的这位忘年朋友却未提及罗写小说(如果确实写过小说,是否应提“编写小说××种”呢),而别后60年中,连罗的去向行踪,是死是活,这位忘年朋友都一无所知,几百年后的人又凭什么确认这位戏曲作家罗贯中就是《三国志演义》及《水浒传》等小说的作者?再则,从这位戏曲作家留下的三个戏目(其中《风云会》戏文今存)看,在取材上与三国故事、梁山故事毫无关系。如果说这位戏曲作家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小说的作者,即使他在40岁以前还没来得及编写,他也应该对二书素材的兴趣很浓,很多故事情节谙熟于心,在他的戏曲创作中应该有所反映,何以在他老朋友的记载中连一出“三国”戏或“水浒”戏都没有?因此认定元代的戏曲作家罗贯中为编写《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的小说家罗贯中是没有根据的,何况籍贯也不相同,而戏曲作家罗贯中之名是否叫“本”也不得而知。

其次,再看万历年间个别文人的言论。万历十七年(1589年),署名天都外臣(沈德符说是汪太函的托名)者在《水浒传》序中说:

“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指《水浒传》），共一百回。”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万历间文人胡应麟（万历四年举人）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中称：“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也。”

万历年间的几位文人距明朝建国已有200年，时间很晚。天都外臣所说“洪武初，越人罗氏”，只是“故老传闻”。200多年中的传闻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很难确定，不足为据。李贽所说“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也是想象推断之词，令人难以置信。胡应麟称《水浒传》为元人武林施某所编，而编写《三国志演义》的罗本又为施的门人，更属望文生义，借题发挥。他这段言论是从社会上已流传很多年的《水浒传》的题署“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附会发挥来的，根本没有材料依据（他说“偶阅一小说序”，称施某于蔽楮中得108人材料，因而演成小说。此序纯属伪作）。他这样一附会发挥不要紧，便把《录鬼簿续编》上记载的元末戏曲作家罗贯中扯了进来，两方面似是而非的材料绞在一起，造成了元末戏曲作家罗贯中同时也是编写《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等小说的小说作家的假象。

另外，记载《三国志演义》一书及其作者罗贯中的还有两篇文字值得一辨。一篇是署名林瀚的《隋唐志传·序》，另一篇是署名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林瀚的序文载于杨慎评《隋唐志传》和褚人获著之《隋唐演义》卷首，两篇文字略有不同。《隋唐志传》林瀚序曰：“《三国志》，罗贯中所编，《水浒传》，则钱塘施耐庵集成。二书并行世远矣。”《隋唐演义》林瀚序曰：“罗贯中所编《三国志》一书行世久矣。”序末题署为：“时正德戊辰仲春花朝后五日，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致仕前吏部尚书国子监祭酒左春坊左谕德兼经筵日讲官同修国史三山林瀚撰。”《演义》序比《志传》序前文少“《水浒传》则钱塘施耐庵集成”一句，后文多“时正德戊辰仲

春花朝后五日”一句。林瀚(《明史》有传)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官居高位,如果这篇序文确实出自他手,应该说是较早提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及二书作者的人,他说“二书并行世远矣”,当是最值得重视的言论。但仔细推敲,这篇序文有明显的漏洞。其一,曾做过南京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高官的林瀚,在小说被上层士大夫轻视的年代,不大可能参与演义小说的补编且为之作序,更不能在序文后题署一大堆官衔。如果他确实爱好此道并参与其事,也只能署上假名或别号。其二,序文末题署的“正德戊辰”,为正德三年。林瀚于正德元年(1506年)四月后由南京吏部尚书改为兵部尚书,“命未至,瀚引疾乞休”^①,并未致仕。正德二年二月,因言官戴铣事触怒宦官刘瑾,“谪瀚浙江参政。致仕。”^②序末题“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致仕”,显然与史实不合。这一点孙楷第先生早已指出^③。其三,弘治初年江苏昆山一带流行的画有梁山英雄图像的叶子依据《宣和遗事》而不依据《水浒传》小说,证明《水浒传》当时尚未成书^④,而正德三年(1508年)写成的林序则称《三国志》、《水浒传》“二书并行世远矣”,可见此序并非成弘时人林瀚所作,当为后人伪托之作。《隋唐志传》刊刻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晚于正德三年110多年;《隋唐演义》乃清代人作品,刊刻时间更晚。孙楷第先生说:“此杨慎评本《隋唐志传》号为林瀚编次者,其书当出于词话,其增唐季事,当即万历间书贾所为,所载林瀚序,盖依托耳。”^⑤孙先生之言是也。

署名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称:“公讳子安,字耐庵,元末赐进士出身,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盖公死之年,七十有五,而余尚垂髻。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烛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

①②张廷玉等.明史·林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4:4429

③⑤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8,39,40

④李伟实.从水游戏和水浒叶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社会科学战线,1988,1

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①此文出自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一月八日《新闻报》上登载的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这篇署名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以当事人的口吻,公布了有关施耐庵及门人罗贯中的第一手材料,可谓语惊四座。然而不必认真推敲,便可看出其作伪的明显破绽。我们把其中“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一段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中“贯中,名本,钱塘人”,“所著小说甚夥,明时云有数十种(《志余》),今存者《三国志演义》之外,尚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水浒传》等”一段相对照,便可一目了然。原来,所谓《施耐庵墓志》上的这段话,是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抄来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12月出版上卷(含第十四篇),1924年6月出版下卷,1925年9月合订成一册,由北新书局印行。20世纪20年代末,胡瑞亭等人伪造明代人王道生撰写《施耐庵墓志》时,抄袭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中的这段话,把署名罗贯中的著作,转嫁给施耐庵,其抄袭最为拙劣之处是把鲁迅标明出处的《志余》(即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也误归入施耐庵著作之列,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令人不解的是,就这样一件假冒伪劣产品,竟然被一些同仁视为珍贵史料,并据以证明元末明初白驹(今属江苏省大丰县)人施彦端即《水浒传》小说的作者施耐庵,且罗贯中又为施的门生,岂不令人遗憾!

在具体分析和辨别之后,我们再从整体上对“元末明初”说进行审视。我觉得坚持“元末明初”说的学术界同仁很难回答如下问题:如果《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著作成书于元末明初,那么这两部高品位、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通俗小说著作自明初至弘治初100多年间是怎样在民间流传的?这两部有深远影响的长篇巨制,无论是欣赏它,还是反对它,为什么文人的著作、笔记、官方查

① 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133